◆观 点

中国改革的“饭碗经济学”

从中国人的习惯说法就知道“就业”多么重要：谋生叫“糊口”，岗位叫“饭碗”，受雇叫“混饭”，花积蓄叫“吃老本”，混得好叫“吃得开”，受人欢迎叫“吃香”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动情地谈到过他见过的“零就业家庭”：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，真是毫无生气，没有希望。生存最底线的需要是温饱和希望，而有了“饭碗”才有希望，就业自然就是最大的民生了。

盘点李克强总理的讲话，会发现有两个被强调得最多的关键词，一个是“改革”，另一个是“就业”。而且这两个关键词常被放在一起说：加力改革，力保就业——这被不少专家看作是“总理经济学”的核心。确实，改革与就业密不可分，现在已经形成共识，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——而“红利”具体表现在哪里呢？无疑，就是就业。

从“饭碗”看待中国的改革，会发现3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最大的红利就是创造了无数“饭碗”，也就是巨大的就业机会。得就业者得天下，为老百姓赢得了饭碗，就赢得了改革，赢得了民心。

以下这组数据最能说明中国改革的“饭碗经济学”：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巨大就业增量，不仅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了饭碗，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新增劳动力与下岗职工，也主要通过走向市场而获得了饭碗。统计显示，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，就可以拉动上百万个就业岗位，让上百万人捧到饭碗。中国8%以上的增长率维持了多年，支撑了无数人的饭碗。

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，也是以饭碗这个最大的民生为导向的。当下改革最大的特征是放权，将一些集中在政府手中的权力让出来，放权给市场，放权给社会，放权给公民。放权带来的最大红利，就是就业机会。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就业经验都证明，是“小企业”在更多支撑着“大就业”，而不是那些巨无霸的“大企业”。

为什么高层领导对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念兹在兹？税收改革要助力小微企业，金融创新要有利于小微企业，关键领域要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，就因为意识到中小微企业的“就业最大容纳器”的作用。

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，有两层意义，一是放权改革，在创造就业岗位中给无数人增加了就业机会，另外一层常被忽略的意义是，通过“限权改革”使就业机会更平等，使一些昔日被特权所垄断的就业机会向每个人平等地开放。对多数人来说，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增量改革。这样的改革虽然从总量上没有增加新的就业岗位，但过去有些岗位被内部人士垄断，如今每个人都有机会平等地去争取了，对很多人就是“多”出来的就业机会。

如果“饭碗”被垄断，那就不是就业机会，而是固化的特权福利，改革从既得利益者那里抢出这些饭碗而放到市场上，就是创造了新的饭碗。从推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，到促进企业在用人制度方面的改革，打破“内部招聘”，严禁“萝卜招聘”，推进公务员招考的公开透明，绑住权力的手，挤压“关系招聘”的空间，这样的限权改革也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。

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，另一层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就业者自身。这个命题上，我们都有一种天然的惰性，天经地义把自己当成一个改革的受益者，站在“享受改革红利”的角度看待这场改革：改革是别人的事，别人在通过改革为我们创造就业机会，我们天然地需要一个别人准备好的就业岗位。

这种思维是错误的，改革创造新就业机会，不能等别人提供果实让你享受，每个就业者也要去改革。比如要改革自己的就业观念，才会创造出就业机会，政府力推中小微企业，可如果一些人眼高手低，只盯着北上广深，只盯着大城市的大企业，对很多条件不错的中小微企业抛出的橄榄枝视而不见，那么别人创造再多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用。（2014年4月2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曹林）

重大事故渎职罪案中司法调查不是“配角”

重大责任事故与渎职犯罪总是如影随形，但重大责任事故频发，背后的渎职犯罪不一定全被追究。近日，最高检察院再次强调，已设立“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办公室”，对国内发生的重大生产事故、交通事故等进行专门调查。

渎职罪案侦查，过去有总结存在“三大难”（发现难、立案难、查处难）。而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，网民对重大责任事故的“围观”，使得渎职罪案要想再沿袭过去的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，已变得越来越困难。

检察机关设立“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机构”，就是有助发现渎职罪案的必要举措。在以往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中，我们常见行政部门在主导调查，即便调查组邀请检方参加，检察机关也往往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。

这种常态化的行政调查主导模式，客观上妨碍了渎职罪案的查处。因为渎职者常常就潜伏在与重大责任事故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中。我们无法期待主导责任调查的行政官员会将他们的同僚，甚至将他们自己拱手交出。这就像命案的侦破，不能期待杀人犯会主动自投法网一样。

渎职罪案“发现难、立案难、查处难”等顽症之所以难除，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，有些行政部门主导甚至垄断事故调查信息，渎职官员究竟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，也就在信息的封闭中被遮掩过去。所以成立一个专门的“重大责任事故办公室”，有助于发现问题，同时吸引更广大的公众都来参与反渎职。

还需注意的是，侦查权与司法权在性质上完全不同。司法以被动和消极为美德，而侦查则是一项主动的权能。只要哪儿发生了罪案或发生了可能隐含涉嫌渎职的情形，侦查部门就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展开独立调查。司法调查与行政调查可并行不悖。即便是两者有冲突，行政调查也应让位于司法调查。包括主动邀请中立的第三方专家介入调查，都应成为渎职罪案的侦查选项。

民心可用。这从每次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，民众的反应就可窥见一二。这种民心所向，也就是对检察机关侦办此类案件最大的支持。问题也许在于，检察机关应如何正视并运用这种民众的支持，更好地将“重大责任事故司法调查”运行好，并最终让民众在每一宗渎职罪案中也看到公平与正义。（2014年4月29日《新京报》社论）

警惕共有产权房沦为少数人盛宴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公布了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2014年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，通知提到，为探索发展共有产权住房，确定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成都、淮安、黄石为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城市。

所谓共有产权房，是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房时，可按个人与政府的出资比例，共同拥有房屋产权。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如果居民的购买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了，也可以从政府手中将房屋产权“赎回”，使其变成居民所有权房。

应当说，探索建立共有产权房机制，对于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，确实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，共有产权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，也会遇到很多矛盾和问题，操作难度很大。

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哪些群体可以享受共有产权房。要知道，凡是纳入共有产权房范畴的住房，一般情况下，都注入了许多政府优惠政策。也就是说，是政府“贴”了钱的，是为少数买不起房的居民提供的社会福利。那么，享受者的身份确认就非常重要。

虽然从表面看，地方都有中低收入的标准，也都建立了中低收入人群的资料库。但是，这些资料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，其公平性、准确性如何，可能没有人说得清楚。同时，资料库建立以后有没有进行过调整，也是一个问题。

而从前些年来看，一度非常流行的经济适用房，就成了许多权力拥有者的盛宴，成为一个黑洞。推广共有产权房，也必然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。如何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问题，应当是一个考验。

而且，共有产权房的推出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居民必须有自主产权房的欲望，更不愿意通过公共租赁房等解决住房问题，势必会给住房问题带来更大的压力。

事实上，从其他国家，特别是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来看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，完全依靠产权房是不行的。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，人人都有产权房是根本做不到的，而必须有一部分人群通过公共租赁房等方式保证居者有其屋。

实际上，政府如果真的想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，还是应当从商品房、保障房和公共租赁房三个层面来解决。其中，保障房是为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人群建立的，公共租赁房是为中低收入人群设立的。中低收入人群要想从公共租赁房中“解放”出来，就必须依靠其收入水平的提高，靠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辛劳，而不是政府资助。否则，就只能享受公共租赁房，而不应当享受具有自主产权的住房。

共有产权房，严格地讲，应当给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。因为，他们才具有将来“赎回”产权的能力和机会。同时，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，帮助他们增强创业的热情和决心。当然，对申请共有产权房的年轻人，也必须有收入水平的限制，并不是每位年轻人都能享受这样的社会福利。

总之，进行一定范围的探索是可以的，但不适宜全面推广。尤其在对居民收入无法完整了解以及各种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，共有产权房的问题会逐渐暴露。（2014年4月29日《经济参考报》谭浩俊）

◆文 坛

不妨给邻人一个真诚的微笑

中国传统社会，无论城乡，本质上都是熟人社会，亲属、邻里和同事等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要路径。邻里关系，往往在传统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网中处于轴心地位。

然而随着经济发展，城市的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迁。邻里之间原本那种温情脉脉、其乐融融的关系，因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森林的耸立而逐步瓦解，成为记忆。“隔着一扇门，两个世界人”的景观，对于头脑中依然残存着邻里温情记忆的中国人来说，无疑会构成一种比较强烈的心理触动。

应该说，熟人社会逐步为陌生人社会所替代，是城市建设提速的副产品。因为，城市建设势必带来城市外观的改变，它意味着市民居住的形制和区位上的改变。新的城市社区替代了旧的街坊，原有的邻里关系被拆解、重组。老街坊规划拆迁了，老邻居各散东西了，《繁花》一书作者金宇澄笔下“阿宝与蓓蒂并肩坐在屋顶，任东风拂面，听浦江船鸣”的那一幕也只能是老一辈人的少年旧梦了。

有必要指出的是，传统邻里关系虽令人怀想，但并不是说这种人际交往方式就值得人们无条件推崇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以熟悉程度为评判尺度、以交情深浅为处事标准，与现代社会更注重契约与法制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。在城区改造步伐加快、市场意识深入人心的当下，人们的权益意识不断提高，对个人隐私的呵护也日益加强。用一扇门来阻隔外界的纷扰、他人的窥探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客观地说，适应陌生人社会的行事规则，是一个现代城市人必备的素质。

当然，陌生人社会并不等同于人情冷漠甚至麻木不仁的社会，新的城市社区也并不是无数“老死不相往来”居民个体的机械组合。居住环境的改善，若要付出人际关系疏离的代价，显然有违城市发展的初衷。在城市社会学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芝加哥学派认为：城市决不只是住宅区的生硬组合，也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。事实上，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，欲正常发展，如何构建社会信任都是不可回避的课题。与邻陌路乃至以邻为壑的做法，会极大增加社会管理和运行的成本。

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，从早至晚，刷牙漱口的自来水、给孩子温热的牛奶、上班乘坐的地铁、闲暇阅读的报纸、出差订购的机票等等，有形的产品也好，无形的服务也罢，其实都是陌生人提供的。如果每个人在接受这种产品或服务时，心里都盘旋着“他是不是下药害我”的念头，那么这个社会将寸步难行。

城市的现代化不应使人心沙漠化。在城市社区重构的大趋势中，政府的社会性职能逐步向社区转移，由此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向社区集中。为此，重构一种新型的社区邻里关系便成当务之急。它应是一种责权利边际更为清晰但也更为有机的团队关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制度与契约不可少，温存和信任亦不可少。无论你住在哪里，你能施与和求助的对象多半还在身边，除了家人就是邻居。消除“世上最遥远的距离”，不妨从对陌生的邻人送出一个真诚的微笑开始。（2014年4月17日《东方早报》杨健）

◆评 论

每个人都是“价值出口”

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：公交车上摩肩接踵、拥挤不堪，车下的人呼喊车上的人往里走走，让车下的人多上来些，却鲜有人理睬；但是当车下的人上了车，也会对“往里走走”的呼喊置之不理。显然，坊间讽刺这种现象，是在慨叹一种不良风气：只要求他人做得好，不愿自己先做好。

公交车上的故事是一个现实的隐喻。今天，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呼唤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、更加诚信的市场氛围，也痛感于一些现象背后的道德滑坡、底线失守。可以说，涵养核心价值观，是社会的共同诉求。然而，如果像公交车上发生的那样，每个人都等着别人行动，恐怕最终无济于事。具体地说，每个人都是“价值出口”，核心价值的弘扬，有赖于每个人的努力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核心价值观是抽象的概念，与现实的生活有距离，更与具体的个人无关。殊不知，所谓命运共同体，正是无数个体的联接；所谓社会风气，更是每个人道德水平的体现。诚然，面对种种社会不公、失德事件，每个人都有批判的权利，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批判，不能起而改之，社会风气如何好转？人人都相互猜忌、相互提防，友善又从哪里开始生长？

甚至是，嘴里抱怨社会不公平，自己有机会一样找关系、走后门；心里呼唤依法办事，事到临头首先想到的不是诉诸法律，而是找熟人摆平；批评别人在跌倒老人面前当看客，身临其境一样悄然走开或者默默围观……如果一面热衷于批判社会阴暗面，一面又想利用社会潜规则为自己谋利，那么个人言行的南辕北辙，只会给社会道德注入更多负能量。

“你就是他人的环境”，每个人的嘉言善行，就是核心价值的无声宣示，也是道德伦理的最好说服。批评“萝卜招聘”，能不能从自己开始践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竞争原则？抱怨广场舞大妈打扰他人休息，能不能让自己在行使权利时不损害他人自由？别忘了，热情洋溢地针砭时弊固然是通往道德高地的捷径，但是只有脚踏实地的点滴行动，才能真正铸就社会的道德地基。

有人说，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天使。一个人的善行，也会在他人心中激起善的涟漪，形成“传导效应”。曾经，坚持匿名捐助的青岛“微尘”，从一个人成为一个群体，进而成为爱心符号；15年，上千万元匿名捐款，宁波的“顺其自然”写下爱的传奇，让100万市民成为同行者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，但是社会关系也是人的总和，每个人都能改变自己，何愁不能最终改变环境？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，必须融入社会生活，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、领悟它。核心价值何时落地，归根到底取决于有多少人身体力行。我们能不能告诉自己：在每一个想要批判的时刻，能不能有一种实践的冲动？毕竟，每个人都是价值出口。（2014年4月24日《人民论坛》鲁军）

◆纵 横

英美之间是怎样实现渐进式换位的

美国从1783年独立到二战后全面取代英国霸权地位，历时160余年。1783—1865年是第一阶段，历时82年，基本态势是英强美弱。第二阶段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18年一战结束，美国迅速崛起，形成美英“均势”状态，历时53年。第三阶段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后完全取代英国，历时30年。从美国角度看，这是从劣势到均势，再到优势的历程，而且“取之有道”；对英国而言，这是从打压到妥协，再到退让的历程，不得不“让之有利”。一取一让之间，虽激烈博弈，但避免了生死之争，渐进式霸权转移完成。

第一阶段：英国打压与美国抗衡。这一阶段从1783年美国独立到1865年南北内战。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，但英国虎视眈眈，伺机卷土重来，而年轻的美国野心勃勃，急于扩张。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、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霸权地位，多方面打压美国，甚至企图分裂美国。美国经济、科技和教育落后，政治松散，内部矛盾多，不得不长期处于弱势，不过，国力虽弱，为求生存发展，必须敢于抗衡英国。两国矛盾尖锐，常有冲突。

第一次大冲突是1812—1815年第二次美英战争。美国向英国宣战，直接原因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，任意劫持美国商船和水手，深层原因是双方互相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底线，激烈争夺美洲霸权。美国企图借机“解放”加拿大，扩张领土，控制北美，将英国彻底逐出美洲；英国要捍卫加拿大和帝国“海权”，企图借机武力“粉碎”美国，于是攻占其首都，焚烧总统官邸。由于美国顽强抵抗，双方停战，以“平局”结束，恢复战前状态。这意味着美英相互冲击对方底线，查明了成本—效益关系。

第二次大冲突发生在1861—1865年美国南北内战时期。这是美国崛起中最艰难的时刻，也是英国扼杀美国崛起的大好机会。

在第一阶段，美国地大物博，野心勃勃，但国力不足，内部不稳，一方面必须敢于以弱抗强，以求生存发展，另一方面不得不有所收敛，内外兼修，争霸限于美洲。由此形成了此阶段的渐进式争霸战略：稳固内部和养精蓄锐、韬光养晦和避强击弱。同时，美英经贸关系密切，相互需要对方的市场和资源，基本无损双方资本集团的利益需要，这为渐进式霸权转移准备了基本的经济条件。英国有亡美之心，但美国的抗衡使其风险成本太高，最终无可奈何。

第二阶段：美国崛起与英国妥协。这一阶段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18年一战结束。英强美弱态势告终，两国比肩而立处于均势，面临多国争霸的新世界格局。美国跨出美洲，开始面向世界争霸，渐进式霸权转移进入了有重大实质意义的新历史阶段。根本原因是美国迅速崛起，国力赶超列强，英国虽依托大英帝国仍有较大综合实力，毕竟逐渐衰落，无力打压，相反，需借助美国抗衡德国的崛起争霸。于是，19世纪末，英美出现改善关系的“大和解”。

这个阶段正值美国“镀金时代”，是美国赶超的关键时期，国力取得四大进展：逐步解决经济、科技和教育落后问题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腾飞；通过一系列改革，调控政治松散、腐败严重和社会经济矛盾等国内问题，强化了国家凝聚力；完成了大规模领土扩张；军事力量崛起，奠定了争霸世界的武力基础，而且择机加入一战，大扬军威。

在第二阶段，美国由弱变强，内部稳固，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，具备了实力，迫使英国有限妥协退让，又似乎不“急于求成”，形成了此阶段的渐进式争霸战略：实力在先、争霸在后，“有所作为”又“进取有度”。英国已无亡美之心，反而开始和解以求利用，“让之有利”。

第三阶段：合作与遏制中的霸权转移。这一阶段从1918年一战结束到二战后，历时30年，渐进式霸权转移进入了最后的决定阶段，在英美既彼此合作又相互争夺遏制中基本“顺利”完成。此时出现了两大历史变化因素：一是两国基本战略态势大变，英美均势告终，进入美强英弱阶段。历史天平不可阻止地倾向美国。二是两国再次面临多国争霸的新的世界格局，产生各怀异心的“共同需要”。衰落的英国面对三个最强大竞争对手德国、美国和苏联，既无力独自对抗，也难以玩弄均势制衡从中牟利，霸权地位已摇摇欲坠，问题只是“花落谁家”。

一战中，美国大发战争财，意满志得，英国受重创，继续衰落。二战中，虚弱的英国自身难保，再受重创，不得不又依靠美国援助以抗衡德国，对美负债高达200多亿美元。相反，二战中美国大发战争横财，成为世界最强国，拥有最有利的战略态势，全面争霸的时机成熟了。

总之，实力更强大的美国利用英国的困境，步步为营，逐次争夺，形成了第三阶段渐进式争霸战略：当仁不让又“取之有道”，既合作牟利又遏制防范。英国且退且战，尽可能争取“让之有利”。最终，英国迫不得已，和平交出百年霸权地位，沦为二流大国，代之以英美“特殊关系”：衰落的英国和称霸的美国相互利用的关系，但实际在更大程度上是战后英国需要继续依赖和利用美国。至此，英国退让，美国进取，渐进式霸权转移完成。（2014年3月下《学术前沿》吴必康）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：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：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：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：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：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：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：xuexishibao@126.com
定价：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：1—267 国外发行代号：W3970 开户银行：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：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：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：人民日报社印刷厂